

刚从上海参加了一个著名企业举办的冷餐会，隔了一天，我又参加了在济南的一个酒桌午餐。这两个酒会风格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冷餐会气氛融洽，主客双方随意沟通交谈甚欢；而酒桌午餐形式呆板，尤其是席间的强制性劝酒，让我这个恐怖喝酒的人极为反感。

博客丛林

# 陈腐的“酒桌文化”

黄鸣

那是一个大型会议的酒桌午餐，其中一位主

宾反客为主（看似属本桌德高望重者），向同桌所有的人强迫敬酒，他自己喝两杯其他人喝一杯，还振振有词，说生意上生活中不让朋友同事受伤受害损失。谁都知道喝多了难受，会损害健康，但是大家宁可难受、损害健康也不能不喝，因为不能不给敬酒人面子。这个“重情轻身”的仁兄口口声声说生活中生意上都为别人着想，为什么在酒桌上可以理直气壮地损害他人损害自己，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不知大家是不是认真地思考过：为什么都怕伤身体，都知道多喝酒后胃难受而都不能拒绝这种劝酒？

为什么少数大酒量的人非要强迫小酒量的人和他人喝得一样多？

为什么少数爱喝酒甚至嗜酒成性的人逼着不爱多喝酒甚至不喝酒的人陪着他们一起喝？

为什么不多喝少喝就等于不给劝酒的人面子？

为什么非要把被劝喝酒的人喝坏、喝伤、甚至喝死才能代表重视、敬重对方？

为什么表达友情非要以伤身体来作代价？不伤身体就会伤及感情？

为什么两三个小时的对



为什么要把某人放倒使其不省人事，甚至因此住院？这类事真值得成为某些人酒桌上的唯一目的和席间津津乐道的谈资？

为什么有些人原本都是宽容之人，从不强迫他人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在酒桌上却一反常态，无所不用其极地强迫他人做或许是他们最头痛最害怕最厌恶的事情？甚至都亲眼看到那么多人因喝酒而身心受害还对酒场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呢？

回来的当天，我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检讨：在酒桌上我仅对劝酒之人的强迫喝酒行为做了较强烈的反抗，并对身边的两三个人讲了我对“酒桌文化”的反感。但是我没有像劝酒之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讲自己的“反酒桌”文化。我很后悔。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

观点，没有讲明这种“酒桌文化”对身体的损害，致使大家会误解，甚至还有可能留下一个“不配合”的不好印象。

我只是顾虑如果我们大家在酒桌上争执起来主人会不高兴，尴尬场面会让主人下不来台。而没有想怎么去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来推动这种糟糕的饮食文化向先进的文化转变。

回来想想这中间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在酒桌上，既然他劝全桌人喝酒，我为什么不劝他放弃这种强迫。我想，以后我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反酒桌文化”，不但在我自己主办的宴请中，而且在我以后参加的宴会中，还会继续把这种“反酒桌文化”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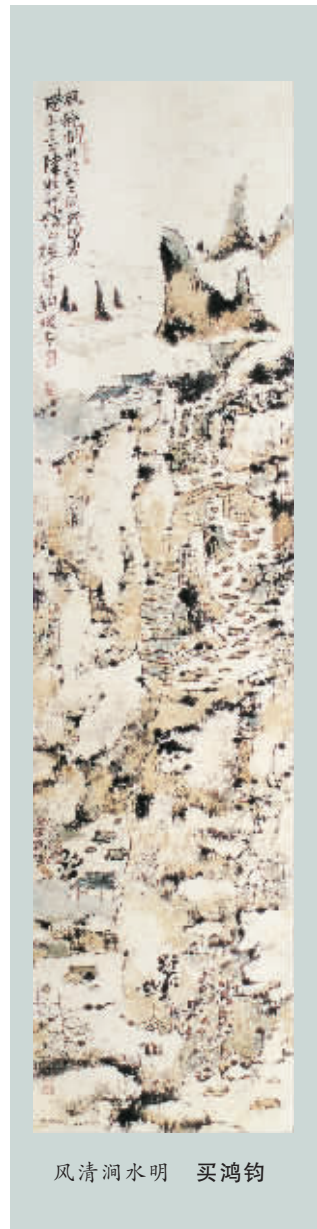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但当前流行的这种“酒桌文化”已经变质。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日常招待客人，那种豪爽、周到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铁？铁！那就不怕胃出血！感情深不深？深！那就不怕打吊针……”那我们酒文化已走了样，偏离了主客双方的初始愿望，成了违背人性、损害健康的“垃圾文化”。“酒桌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解决的办法，在酒桌上，既然他劝全桌人喝酒，我为什么不劝他放弃这种强迫。我想，以后我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反酒桌文化”，不但在我自己主办的宴请中，而且在我以后参加的宴会中，还会继续把这种“反酒桌文化”进行到底。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但当前流行的这种“酒桌文化”已经变质。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日常招待客人，那种豪爽、周到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铁？铁！那就不怕胃出血！感情深不深？深！那就不怕打吊针……”那我们酒文化已走了样，偏离了主客双方的初始愿望，成了违背人性、损害健康的“垃圾文化”。“酒桌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风清涧水明 买鸿钧

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我最喜欢诗，尤其是古体诗词。这一爱好从上小学时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刚上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所有的课都停了，并且课本也不发了。好像是到了1969年吧，上面让复课，但仍然没有教材，每人给发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当课本。那时农村老师少，大多数老师都是“复合型人才”，往往既讲语文，又讲数学，同时还兼班主任。当时我们的那位“复合型”老师据说是个“老右派”，50多岁。课讲得还可以。但可能是怕讲错了担当不起，对《毛主席诗词》，他只领我们读，一句也不作解释。

当时发的那本《毛主席诗词》是64开的小册子，红色封面，共收毛主席诗词36首。每篇诗词都是老师先领我们读几遍，然后让我们自己读。当时年纪小，理解力差，加之老师又不讲解，虽然把毛主席的

得到强化、拓展。

初中毕业后我便回乡务农，一干就是八年。当时的体力劳动十分繁重，每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尽管家境贫寒，生活很艰苦，但可能是因为正处于生长旺盛期吧，我对知识的渴求欲望却十分强烈，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找书看。而这一期间是农村极度贫穷，根本买不起书；二是文化饥荒，除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批

林批孔的书籍外，书店里的书很少，特别是文艺类图书，更是奇缺。而“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图书又大都遭封，想找本书看看都很难。常常是一听说谁有本书，便立即去找人家借，有时甚至用几本书去换人家的一本看。并且是饥不择食，小说、剧本、医学、天文、地理，借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时生产队差不多每天晚

上都干农活，我只有在收工之后才能看书。不论早晚，每晚收工回来，我总要点上自制的墨水瓶柴油灯，再看上一两个小时的书。记得在1974年，我有幸借得一本《宋词一百首》，我用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它。这是我除毛主席诗词外第一次接触到传统诗词，在这里我认识了苏轼、辛弃疾、陆游……而后来又有幸借得了一本

力《诗词格律十讲》手抄本，当时我简直如获至宝，在先看过一遍之后，又一字不落地把它抄了下来。通过这两本书，我不仅对古体诗词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从此开始动手写了起来，我的作品集中所收录的《游卧龙岗》、《隐山行》、《少农吟》等就是这时的作品。

1979年，我凭借着多年来的广泛阅读，特别是曾看过大量线装古籍的古文基础和擅长写作的优势，考入了郑大中文系。虽然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遗憾的是，四年下来四十多门功课中只有古代文学涉及古体诗词的内容，并且又多侧重对诗人的创作道路、作品的时代背景的分析，很少讲作品的谋篇布局，对平仄格律更仅仅是提及而已。后来虽然我曾任在诗词方面也下过一些工夫，但对诗词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律诗的平仄格律始终没能学到家。所以，几十年来，尽管我对古体诗词一直深深地喜爱着，并进行着创作尝试，但不论是在遣词造句、谋境立意方面，还是在平仄格律方面，至今仍然还做不到位。

五月中旬，幼邻携珍妮和女儿玛茜、莱丝琳才到达上海，我和琼英弟同到黄浦码头接船。

幼邻从1937年出国至1947年回国，我们母子分别了整整十年之久。这十年里我望眼欲穿，没说回国还好，一说归期，我便觉得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才盼到今天。

出国时儿子稚气未消，此时站在眼前的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半美式青年。他一见见我，立即飞奔过来，拥抱着我，频频呼唤妈妈眼泪盈眶。我一时间觉得十年间尝尽了酸甜苦辣。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碟，不免也泪下衫襟。码头行人看我们母子相依情景，也觉动情而驻足观望。有知我们母子情况的，均为之啧啧感叹。

还是琼英表侄女过来说：“表伯娘，快看看你的媳妇和孙女吧，他们过来啦。”幼邻才放开我的手，赶忙去把莱丝琳抱起，挽着珍妮和玛茜来到我眼前，对珍妮说：“这就是我亲爱的妈妈，也是你亲爱的妈妈！”珍妮学会几句简单的中国话。遂同我拥抱着说：“妈妈，你好！”孙女玛茜约四岁，小鸟般跳过来，我一手抱起，听她叫我奶奶好！啊！多么幸福美好的时刻啊！我如入梦境。我想，要是德邻也在，就更满足了。

珍妮虽说是在做妈妈的人了，仍然如少女一般腼腆、婀娜多姿，既温柔又彬彬有礼。儿子西走在后面，赶忙过来把玛茜抱起……一家三代，团聚一起，这一天是1947年6月8日。

德邻领我们回到住宅之后，立即同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有德邻在一起，三代同堂，共吃团圆饭，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高兴的事吗？

我们的住宅在东成家立业，她温柔可爱，孙女天真活泼，我觉得幸福注满了心田。

全家团圆，当晚厨师大厨做了满满一桌好菜，给幼邻和珍妮接风。

珍妮是个混血女子，生长在美国，习惯一如美国人，与幼邻婚后，幼邻略为告知我国生活和语言习惯。在美国还带她去唐人街吃过中国饭菜，接触过一些中国朋友，使她对中国有所了解，也略懂一些中国话。她对中饭菜十分喜爱，进餐时我常用筷子比我还妥帖，不禁惊奇。我自己是中国入，却拿不好筷子，常常因举起一个食指被母亲责骂，此时看着珍妮吃饭，忽然想起我年轻时的往事，忍不住笑了起来。珍妮以为是笑她，问幼邻：“妈妈笑我？”幼邻问我笑什么，我说：“我拿筷子比不上珍妮，因此好笑。”幼邻对珍妮说了以后，她也高兴地笑了起来。玛茜则一脸严肃地说：“奶奶，我拿筷子最好啦，爸爸说我本来就是中国姑娘嘛！”大家热烈碰杯。

总布胡同，是一幢古老式的庭院邸宅。这段时间，德邻政务较闲，常常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谈心，逗弄两个小孙女，同享天伦之乐。还带我们去过他的行踪所在地——中南海，在怀仁堂歇息、喝茶，品尝北平著名的宫廷八件。也带我们去吃北京烤鸭。

有时，德邻也参加与我们一起游览，记得游故宫那一次琼英这女孩子调皮，特意坐在慈禧太后的宝座上，要人给她照相，说是要学学慈禧太后那么神气。她正在神气俨然，被德邻过来看见，连忙喝止。说这是明明写着游客止步，岂可胡来。还对我说：“这孩子给敬修娇惯了，你带在身边，可得管着点，不许乱来。不然的话，人家不说她，而会谈我们倚仗权势，为所欲为。”

经此一训，琼英说：“以后游风景，最好只跟表伯在一起，免得扫兴。”

7

连 载

7

7

## 郑邑旧事

### 解放前郑州的搭棚行业

王瑞明

民国初年，当时郑州市面上已有绸缎、南货、杂货、盐商、钱庄、京货、酱菜、糕点、药材、棉花行、烟茶、饭店、旅馆等十八个行业，火车站沿的席棚棉花商行、货栈、仓库、饭馆、茶社、戏园子随处可见。原有建筑不敷使用，为了应急，搭棚业应运而生，流行开来。后来发展到临时性的市场开发、街道、乡村集市会上，有货棚、彩棚、凉棚、暖棚、喜棚、丧用棚、牌楼等各种用途的棚。李济通先生曾在“益民市场今昔”一文中记述：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坟岗集中一次性修建席棚500余间，入住各种店铺近500户。由此可以看出当年搭建席棚出动的棚匠之多，规模之大。

解放前，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大都是无文化的体力劳动者，人叫“棚匠”，俗称“架子工”。据住在南彩虹的贺长贵老人谈：因生活所迫，他十几岁跟随父亲学干搭棚这一行。搭棚技术主要是系绳扣，熟练工扣的绳扣既简便又结实，拆卸时容易解开。那个年头，搭棚用的材料是木架杆和竹架杆、苇席、麻绳。搭棚技艺高超的工匠胆大，手翻麻利，会攀高，无论平地或在屋顶上立杆，很少挖坑，横三竖四，牢固可靠。经营搭棚业的行商，由于后有官方支持，承揽的都是些大型工程，他们除有固定工人外，临时从四乡雇工有时不下几百人，略加教练能爬高上低，就可干活活。搭棚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室外作业非常艰苦，安全无保障，上架子摔伤的事时有发生。还经常受到工头的剥削，搭棚工每天所得收入低微，甚至难以养家糊口，极其清苦。

解放后，搭棚业转入到建筑行业，劳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搭棚的“棚匠”一跃成为搭脚手架的架子工，是建筑工地上不可缺少的一门专业工种了。

洛阳的牡丹花会，郑州的月季花会，开封的菊花花会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你知道吗？郑州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有大型花会了。

明新中学是当年郑州有名的私立学校，创建于1932年。址在老城区的书院街（今市三职中），该校不仅为中原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开创了环境绿化、举办花会的先河。这些成果，都要归功于明新中学的创始人、校长姚明甫。

姚明甫（1880—1970），荥阳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师范，后回乡教书育人，因成绩斐然，擢升为郑州市立中学校长。后改制为私立明新中学时，再任该校董事长兼校长。姚不但治学有方，还善于植树种花，其中尤爱养菊。他家挂有“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中”（杜甫诗）的中堂，办公室贴有“莫嫌老圃秋容淡，犹看黄花分外香”（韩琦诗）的条幅。种菊、赏菊、咏菊成了他茶余饭后的一大嗜好。他自己种，也号召学校师生员工种；家里种，学校也种。为增加花色品种，他自掏腰包，四处

求购菊花名品。使当年明新中学的菊花品种多达四十余个，如珍贵的墨菊、绿菊、香白梨、梳妆妆等，均有种植，并将菊花定为校花。他写的《菊花赋》、《以菊为校花解》，为学子必读之教材。而尤为人们称道的，则是他一年一度举办的重阳菊花展览会。

据该校高材生，已八十三高龄的郑家乾老人回忆：“每年夏历九月九日，在校举办大型菊花展览，从校门到后院（共四进院），室内室外，楼上楼下，走道、庭院，以各种形式遍布各种菊花。名贵菊花都挂上印有红格的纸牌，写明品种、特性、学名，并写有校长或王君海等国文教师的赞诗。这时，各界人士都来参观，市民也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当年花会之盛况，由此可见。

明新中学的重阳菊花展，自1933年起，连办数年。1938年以后，由于战事频繁，学校被迫迁至东街孔庙，加之姚先生后来调至省城开封，这个别开生面的大型花会，也就在郑州销声匿迹了。

## 郑州最早的花会

李济通

荷花 无忌 摄影

7

## 虫王庙

肖自才

王李世民。唐王看到这一蝗虫造成数百万百姓的痛苦，一怒之下，将这只大蝗团团吞下腹去。从此群蝗无首，飞得无影无踪。

事后，众百姓看到唐王李世民真是一位爱民的好皇帝，处处关心乡民疾苦。当年多处大兴土木建祠庙，称李世民为能震灾害虫的“虫王”，并长期以祀之。

此庙宇肇建年代不详，但据清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所载，该庙宇经历代多次重修，到民国年间，该庙已建有大殿，中间为唐王李世民塑像，手托飞蝗，面部作怒视状，栩栩如生，并建有廊庑、山门、戏楼等设施，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有古庙会。每逢会期一般都唱两三天大戏，各村会首另组织不少香火活动，四方来此香客众多，香火旺盛。都祈求蝗不入境，年年五谷丰登。古庙会一直相沿至今。可惜上世纪50年代初，虫王庙古建筑遭人为毁坏，目前只是遗址尚存。但庙旁的岗丘已全部绿化，林木茂盛。每年的会期仍在遗址前举办。

中牟县南五十里、张庄镇境内的翟庄村东侧岗丘上。原为陈州——郑州官大道经此。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载：“虫王庙在县南五十里辛兴里。”据传此庙是为供奉唐王李世民所建的祠庙。唐初年间，有一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大面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从天而降。群蝗过后，将所有的庄稼，甚至树木及所能食植物啃食一空，农作物绝收，造成特大灾荒。蝗过境之时，当地百姓在树上捉住一只大的飞蝗，众称“虫王”。将这只蝗王献给了唐

王李世民。唐王看到这一蝗虫造成数百万百姓的痛苦，一怒之下，将这只大蝗团团吞下腹去。从此群蝗无首，飞得无影无踪。

事后，众百姓看到唐王李世民真是一位爱民的好皇帝，处处关心乡民疾苦。当年多处大兴土木建祠庙，称李世民为能震灾害虫的“虫王”，并长期以祀之。

此庙宇肇建年代不详，但据清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所载，该庙宇经历代多次重修，到民国年间，该庙已建有大殿，中间为唐王李世民塑像，手托飞蝗，面部作怒视状，栩栩如生，并建有廊庑、山门、戏楼等设施，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有古庙会。每逢会期一般都唱两三天大戏，各村会首另组织不少香火活动，四方来此香客众多，香火旺盛。都祈求蝗不入境，年年五谷丰登。古庙会一直相沿至今。可惜上世纪50年代初，虫王庙古建筑遭人为毁坏，目前只是遗址尚存。但庙旁的岗丘已全部绿化，林木茂盛。每年的会期仍在遗址前举办。

中牟县南五十里、张庄镇境内的翟庄村东侧岗丘上。原为陈州——郑州官大道经此。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载：“虫王庙在县南五十里辛兴里。”据传此庙是为供奉唐王李世民所建的祠庙。唐初年间，有一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大面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从天而降。群蝗过后，将所有的庄稼，甚至树木及所能食植物啃食一空，农作物绝收，造成特大灾荒。蝗过境之时，当地百姓在树上捉住一只大的飞蝗，众称“虫王”。将这只蝗王献给了唐

王李世民。唐王看到这一蝗虫造成数百万百姓的痛苦，一怒之下，将这只大蝗团团吞下腹去。从此群蝗无首，飞得无影无踪。

事后，众百姓看到唐王李世民真是一位爱民的好皇帝，处处关心乡民疾苦。当年多处大兴土木建祠庙，称李世民为能震灾害虫的“虫王”，并长期以祀之。

此庙宇肇建年代不详，但据清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所载，该庙宇经历代多次重修，到民国年间，该庙已建有大殿，中间为唐王李世民塑像，手托飞蝗，面部作怒视状，栩栩如生，并建有廊庑、山门、戏楼等设施，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有古庙会。每逢会期一般都唱两三天大戏，各村会首另组织不少香火活动，四方来此香客众多，香火旺盛。都祈求蝗不入境，年年五谷丰登。古庙会一直相沿至今。可惜上世纪50年代初，虫王庙古建筑遭人为毁坏，目前只是遗址尚存。但庙旁的岗丘已全部绿化，林木茂盛。每年的会期仍在遗址前举办。

中牟县南五十里、张庄镇境内的翟庄村东侧岗丘上。原为陈州——郑州官大道经此。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载：“虫王庙在县南五十里辛兴里。”据传此庙是为供奉唐王李世民所建的祠庙。唐初年间，有一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大面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从天而降。群蝗过后，将所有的庄稼，甚至树木及所能食植物啃食一空，农作物绝收，造成特大灾荒。蝗过境之时，当地百姓在树上捉住一只大的飞蝗，众称“虫王”。将这只蝗王献给了唐

王李世民。唐王看到这一蝗虫造成数百万百姓的痛苦，一怒之下，将这只大蝗团团吞下腹去。从此群蝗无首，飞得无影无踪。